

遗产

□亚中跃

低矮破旧的平房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霜雨雪侵蚀后巍然屹立。在秋季的夕阳落照中,小院的荒草和瓦砾夹杂在一起显得更加零乱。这幅图景,或许就是我早年在中学历史课本中读到的“废墟”。我伫立在院子里,凭吊人去楼空的落寞小院,心里抑制不住涌出许多心酸。

这是我的家。严格说来,这是父母的家,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父母的财产。父母健在的时候,就长期居住在这里。院子并不大,从窗下量出去,到大门口也不过十一二米,况且大门口还盖着两间夏屋,一间装着父母多年积攒的旧物,另一间则装了半屋子的煤。夏屋里存放的铁丝、麻袋、废弃的煤油炉、旧纸盒子一类的东西,我看着就讨厌,不但碍事,而且上边落满了灰尘和蜘蛛网。每当父母让我到夏屋翻找点东西时,我便很长时间也无法找到,因此还挨父母训斥,抵触的情绪油然而生。有一次,我以帮助父母搞卫生的借口把这些破烂东西全部扔了出去。可是,我亲眼看到母亲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到大道边垃圾坑前把那些东西又捡了回来。

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同时也是奈曼火车站货运主任。货运主任是个实权人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地方各企业和私企大宗货物主要靠铁路运输。当时车皮紧张,货主能请下一个车皮非常不容易。“铁老大”的绰号就是那个年代叫出来的。父亲在那时恰好在铁路运输的主要岗位上。货主每天围着父亲转,说如请一个车皮,就给父亲五千元。可是父亲十分淡然,一点都不为

之所动。气得有些货主背地里大骂父亲不懂人情世故,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人情味。父亲偶尔听别人转述,哈哈大笑,笑完后,脸色变得相当严肃,说:“现在有些人,当了干部,入了党,却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味道”。

“共产党员的味道”,也许这才是父亲骨子里的红色基因和毕生追求。

我和父亲也是常常闹翻的。我觉得父亲实在有点过分。

我在铁路小学当老师的时候,还是八十年代初。几年后铁路分房子了,房子虽然简陋些,但是那年代有房子住,已经不容易了。分房后自然会盖个门房,总要装点杂物吧。我们的工资收入当时只有六七十块钱,两口子加一起月收入不足二百元。盖个房,少说也要几千块钱。我想到了父亲,我不敢开口,就撮掇妻子和我一起去找父亲大人帮忙。父亲想了想说:“这个忙我帮不了,沙子、水泥、砖、檩子、工钱,太多了,我找谁去呀,你们自己想办法吧。”父亲说完,不再吭声,屋子里的气氛尴尬到极点。我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平静地对妻子说,咱们走吧。于是,我们走出父亲的家门……

我开始了大白天到处游逛捡砖头的生活。谁家盖房子拆掉的半拉砖,只要人家给,我就要。足足有一个多月,盖门房的材料准备得差不多了,就自己动手盖房子。我一个帮手都没找,画线、摆砖、和水泥、砌墙。下班后或是星期天,我一个人扛起了一项伟大的盖房工程。一天中午,我实在太累了,不管脏不脏,躺在地上就睡着了。不一会,我被人扒拉醒了,睁开眼睛一看,是父

亲。我愣愣地看着父亲,不知为什么,我的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父亲静静地看着我,半晌没说一句话,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帮你吧,小时候我没少干这些活……”父亲拿起地上的铲子蹲下来开始砌墙。

父亲常说:“自己的日子自己过,不要指望别人。”父亲好像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一点也不随潮流。

一天,有个货主找到父亲,说有一百多只羊要卖到南方去。羊已经赶来了,圈在站前一个破旧的大院里。父亲查看了一下运输计划,说:“这羊走不了,没计划,没车皮。”货主瞬间涨红了脸,急得说话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亚主任,你可要帮我呀,我是从各地收来的羊,我连草料都没有准备呀,这羊要是走不了,损失可就大了……”父亲说:“别着急,我给你想想办法。”货主从兜里掏出大约二万块钱来,趁着跟前没人,塞给了父亲,父亲非常生气地制止了他,并严肃地说:“收起来,我这个人从来不搞这一套,你不了解我。”说完,硬是让货主把钱收了回去。父亲拿起电话,马上找分局计划部门联系,分局又找沈阳铁路局计划科变更计划,为这位货主特别配备两辆敞车。第二天下午就把羊装走了。

过年过节,万家团圆。追求幸福生活是人们的美好向往,可是我们家过节,往往都有些与众不同。

大家坐在一起,酒过三巡,父亲又开始讲述他过去的故事:“我从小就没了父亲,和你奶奶下地干农活。晚上,坐在小板凳上看你奶奶纺线。你奶奶可以不点油灯,摸着黑纺线,一点都不打疙瘩。第二天起早三点多钟我就跟着你奶奶,用驴驮上纺好的线到北票县城去

卖。那时候,山区有狼,我和你奶奶还碰上过一次,那狼就蹲在大山道上,眼睛发着绿光,我的心怦怦跳,你奶奶说,你个挨刀的,我们娘俩孤苦伶仃的,要吃你就吃吧,也不怕雷劈了你。那狼似乎听懂了人话,呆了一会,转身向远处跑去了……”

父亲讲的往事,好像传奇故事。“你们现在生活好了,有的还当了官,有的入了党,你们要好自为之,不能捞钱。这辈子我没少经历各种运动,冻不着饿不着就行了,别把自己弄到监狱里去,到那时,妻离子散,家败人亡。你们可都是党员、干部……”

父亲的话重千金,字字砸进我们的心中,融化进我们的血液,并在我们的思想和灵魂里,种下了红色基因。“谁让咱们是党员,是干部。党员就要有个党员的样子,干部就要有个干部的样子。”开会的时候,父亲经常这样讲。

父亲离开我们几年了。去世前,他把儿女叫到医院病床前,告诉我们说,他一生并没有什么遗产,只留下自己住的一个铁路平房,价值也不过几万元。

我们没有把房子卖掉,我偶尔会回去看看,站在小院子里想想过去的事。“党员就应该有党员的样子……”

这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全部遗产。



枣儿红了

□赵素霞

周日休息去朋友家做客,看见他家小院内的一棵枣树上,结满了红红的大枣,就像一个个红红的灯笼悬挂在上面,煞是好看。朋友看出我喜欢枣子,便踮起脚尖摘下来一些给我吃,我顾不上卫生,拿过来一颗就放进嘴里。

我喜欢吃大枣,是缘于婆婆在世时的一个秋日里。那天婆婆来电话,说她前几年在山坡开荒地里栽的那两棵大枣树结了许多枣,她摘回来有200多斤,叫我抽空回家看看。放下电话,我的心为之一震,带着一种愧疚的心里,踏上了回家的路。

经过四个多小时客车的颠簸,我回到了婆婆家。我推开院门,看见满院子珠粒般红红的大枣,惊呆了。那红红的大枣,就像天上密密麻麻的星星,在阳光的照射下红得耀眼。一路奔波饥饿的我,随手拿一个放进嘴里,清脆香甜,真是太好吃了,可以说,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香甜的大枣。想必这就是婆婆引以为骄傲的劳动成果了。

走进屋内,我喊了一声:“妈,我回来了!”屋里静悄悄的,原来婆婆不在家。邻居大姐看见我回来了就过来搭话,这位健谈的大姐说:你的婆婆每天总不闲着,别看已是70多的人了,身子骨还蛮硬朗,春天上山拾柴,夏天薅草喂猪,秋天就摘下一院子的枣子,冬天则戴上老花镜,一针一线地缝制绣花鞋垫,托人拿到集市上卖……正唠着,婆婆回来了。一身的尘土,一脸的汗水,稀疏花白的头发上还粘着几片枣子叶儿,背着一个布口袋,步履蹒跚却很有力。我的眼睛一热,急忙接过婆婆背上的袋子:“妈,您这是何苦呢?”“嗨,闲着也是闲着,去山上把这些枣儿摘回来,还能活动活动筋骨。”婆婆随口应着,见我还要说什么,忙扯了我一把:“进屋吧,上车饺子下车面,今天给你擀面条!”婆婆的神情告诉我,在这满院的枣子背后,还有老人家的另一桩心事。

在家住了两天,左邻右舍都过来串门,我被浓浓的乡情包裹着,已顾不上细问婆婆的心事了。这两天,婆婆也没出去摘枣子,只是在家一遍遍地翻弄着院里的枣子,一个一个挑着,选着,装入一个干净的布袋里。要走那天,婆婆让我带上她精心挑选的那袋枣子,我于心不忍,但在婆婆的再三坚持下,只好拿着。走时婆婆执意要送我一程。路上,婆婆没说一句,一直把我送到村口的停车点,等车时,我说:“妈,您回去吧,以后别再去摘枣了,劳累还危险的,钱不够用,我们多给你一些。”婆婆看了我一眼,叹了一口气:“唉,不是钱不够花,你的哥哥也常给,可我总是寻思着,你们挣钱也不易。前些年咱家穷,你们结婚时,家里什么都没给你们添置,心里总觉得欠点什么。现在我老了,更还不上这笔心债了,山坡那两棵枣树结的枣,多少也能卖些钱,不也省了你们再给吗?”“妈……”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夺眶而出。

车来了。我坐上大客车,透过车窗向外望去,看见婆婆正在向我挥手,清凉的秋风吹起婆婆那宽大的衣襟,使本来就不丰盈体态的婆婆,更显得孱弱无力了。泪光中,婆婆已站成了一株枣子树……

新婆媳时代

“三乐堂”由来

□陈福泰

某日,一个微信朋友让我说说“三乐堂”的由来。说来真有点不好意思,没念几天书,不识多少字,没有多大屋,还要弄个书房,还要起个名。大概在2000年吧,我买断下岗,孩子们结婚的结婚,去外地工作的工作,家里就剩我们两个,顶着几间空荡荡的房子,就弄个书房吧。我从小就喜欢看书,买书,几十年攒了几千册书,又买了几个书橱,摆满了东西两屋。书房弄成了,闲心就大了,一些文化人、大学问家的书房都有名宇,这个斋呀,那个堂的,咱也起个名,就叫“三乐堂”吧。

一是,知足常乐。这是我坚持几十年的信念。我小时放过猪,放过驴,在农村扎扎实实地劳动了十年。那

个年代,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每当我遇到多大困难和挫折时,我都和过去比,和不如我的人比。从来没想过和比我强的人比。所以,人们说我没大出息。我的参照物就是过去的苦日子,只要比那时好一点,就知足,知足了,心里就乐呵。

二是,自得其乐。人,特别是老了以后,不要找气,有些气都是自己找的。找气和找乐费劲是一样的,干嘛不找乐呢?我下岗以后的主要工作是买书、看书、种菜种果、养鸟养鱼、养花种草,把院里面外弄成个植物园。攒点工资就和老伴出去旅游,享受祖国山水,用文化的恩赐洗涤心灵。每逢瓜果飘香的时候,邀几个年老、年轻的朋友来家做客,我亲自下厨,弄几样自己种

的蔬菜,喝点小酒,回忆过去,共叙友情,其乐融融。三是,助人为乐。我们有很多农村的亲戚和朋友,他们大事小事都来找我,有能力就帮他们一把。我非常赞赏郭明义的一句话,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书房名有了,在朋友的帮助下,请通辽市书法家高万年先生书写“三乐堂”,前些年去绍兴遇到全国书法家沈长轩,老先生又为我写了一幅。前年,又请开鲁书法家、全国书法比赛获奖者李鸿学写了一幅,三间屋每间一幅“三乐堂”,一抬头就看它,不管什么时候,心里总是乐滋滋的。



母亲的顶针

□闫英学

顶针,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北妇女普遍的家庭缝纫用品,通常由金属或牛角等塑料制成的环形指套,上面布满小坑,一般套在中指用来顶针尾,使手指更易发力,既不伤手指又能很快穿透衣物。

每当想起“顶针”,就会想起母亲的辛劳;每当想起母亲的顶针,就会想起儿时围坐在母亲身边,看着母亲一针一线为我们缝制衣裤、纳鞋底做鞋的一幕幕场景。

在懵懵懂懂的记忆中,六十年代中期全家随父亲下放。刚到乡下时,还没有通电,一到晚上小村便漆黑一片。

可是无论如何,全家四口人的穿衣、布鞋都要母亲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白天干不完的家活,晚上天黑就要点上煤油灯,用那一点点的光亮,母亲戴上顶针,为全家缝制衣服。

漆黑的夜晚,小小的煤油灯光亮,真是难为了母亲。有时半夜醒来,发现母亲还在挑灯夜战,在灯光的影子下,母亲把做衣服的针放进头发里,反复摩擦几次,使针脚更加顺畅。

到乡下一年时间,村里也通电了。通电那天,只有少数人家准备了灯泡,好在母亲搬家时就有所准备,当晚灯火通明,引来一些村民观看。

村里有了电,母亲在白天干不完的家活,晚上就可以在明亮的灯光下干了,缝制衣服的速度也快了許多。

日常生活中,经常看见母亲右手的中指上戴着顶

针,当初是白色铁制的,后来又戴上了淡黄色牛角制的顶针。牛角顶针冬天用起来没有那样冰凉的感觉,而且当针的尾部顶针上时,也没有铁器接触时的声响了。

有一年上中学,正是春秋换季的季节,学校领导通知我代表学校参加县里举办的诗歌创作会议,母亲连夜为我赶制一件蓝色的布夹克,从当天买到丈量尺寸,从下午开始到后半夜,母亲没有合眼休息,终于在后半夜为我赶制出合身的布夹克。夹克下面是紧身的,一边还有一个铁环,系带用于调整身形,煞是好看。

天亮时,母亲疲惫地用凉水洗脸,又为我们做了早饭,母亲让我穿上这件精心缝制的蓝色夹克,我看到母亲戴着顶针的手有些发红发肿时,鼻子便酸起来。

母亲不但会缝制衣服,还会裁剪,心灵手巧。村上一些妇女时常就来找母亲帮助她们裁剪衣服,样式美观,很受欢迎。

二十岁之前,穿过母亲缝制的无数双布鞋。穿在脚上,在外人看来,不但样式美观、大方,与商店里出售的布鞋没有什么两样,熟悉的人都为母亲的做工精细、双手灵巧不住地赞叹。

七十年代后期,我当兵来到部队。母亲考虑我的汗脚很重,缝制了一双黑色灯芯绒布鞋,让父亲寄到部队,大大缓解了我常年穿部队军用胶鞋带来的苦恼。

母亲缝制的灯芯绒布鞋,在当时很时髦,褐色塑料底,用黑色迪卡布缝制两条压边线,很是精巧,鞋面上口用“五眼”压制,能系鞋带。穿在脚上,系紧鞋带很舒

服。母亲还特意缝制了两双鞋垫放在黑色灯芯绒布鞋里。父亲寄来这双布鞋后,班里的战友都以为是在商店里买来的新鞋,不相信这是母亲亲手缝制的,纷纷夸奖母亲有一双巧手。

在部队期间,虽然没有机会天天穿布鞋,但在休息、上街时或出差便与军用胶鞋替换穿用。有时,躺在床铺上,一想到母亲缝制的那双灯芯绒布鞋,心里就暖暖的。

后来在部队生活中,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把母亲缝制的这双灯芯绒布鞋带到那里,从未离开过。只要是这双布鞋在身边,就感受到母亲的温暖,就会感觉周身热血沸腾;穿上这双布鞋,就会感觉到脚步踏实,故乡就在身边,亲人就在眼前。

在部队里,经常穿着母亲缝制的灯芯绒布鞋,两只塑料鞋底已经出现了“跑偏”,鞋面也灰旧了,鞋帮渐渐开始老化,布面与鞋底接触的两道亚纹也有些模糊。在结束部队生活前,只好不情愿地舍弃在营房里。

岁月沧桑,年轮更替。在不知不觉中,四十多年过去了,唯有母亲的顶针还深深刻印在记忆的深处。

小小的顶针,跟随着母亲几十年,是母亲的顶针“顶”出了我们的幸福,“顶”出了我们的快乐人生。



诗书画影

重阳二首(新韵)

□任占生

(一)

耄耋之年爱乒乓
姬嫂有缘聚一堂
诗词摄影浓墨墨
群中展示众分享
不求扬名勿为利
只图快乐与健康
一年一度秋风劲
九九重阳胜夕阳

(二)

九九重阳金光照
久别难逢盼今朝
岁月荏苒春光尽
人生易老天难老
浮云白日相去远
老骥伏枥壮志消
一年一度雁南行
日迫晚霞景色好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梁立伟 篆刻